

■苑利, 顾军/著

民俗学
研究

中国民俗学:
步入新世纪的
学术思考
苑利, 顾军

中国民俗学: 步入新世纪的 学术思考

[摘要] 中国民俗学在新世纪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这一学科的基础与前提——田野作业能否得到重视和深化。而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加强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加强应用研究,使民俗学真正成为一门“经世济民”之学;以及加强队伍的学风建设,应成为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民俗学;拓展领域;田野作业;应用研究;学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2)06-0070-05

Chinese Folklore: Academic Review in New Century

YUAN Li, GU Ju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Beijing Applied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olleg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smoot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lore lies in whether fieldwork—— its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and premise will be stressed or not. In concrete study, it should be highlighted that we need to strengthen cross discipline research, widen our own academic fields, accentuate applied study to make folklore a study of assisting grass roots, build up Chinese folklore team.

Key Words: Folklore, Widen fields, Fieldwork, Applied research

自中国民俗学从 1983 年复兴以来,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这种成就甚至可以用“辉煌”来形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辉煌的背后,中国民俗学内部还存在许多问题,并潜藏着深刻的学术危机:首先,从学科内部结构来说,与研究相比,田野作业明显不足;由于这种内部结构的失调,导致整个学科都因此裹足不前。从学科外部结构来说,由于我国民俗学的整个学术队伍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起码的社会角色意识,而将民俗研究仅仅当成某种个人的爱好,将自己与社会隔绝开来,因而受到社会的冷落;同时,中国民俗学科还存在过分强调文本而忽视语境、学风不正、学术视野狭窄、缺少

多学科关照能力与意识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会影响中国民俗学在新世纪的正常发展。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鉴于此,笔者曾进行过较多的思考。现将一些不很成熟的想法公诸于众,以期求得学术上的争鸣。

一、加强田野作业是中国民俗学 走出学术危机的必由之路

就像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者的看家本领一样,以民俗志搜集工作为代表的田野作业,也是民俗学者的看家本领。它既是民俗研究的基础,也是民俗研

究的前提。从近 80 年的民俗学发展史看,中国民俗学自发生之初,便很强调田野作业,如中国民俗学产生后的第一个运动——歌谣学运动,便是从歌谣的收集开始的。以后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会以至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似乎都十分强调搜集工作。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俗学相比,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它表现在:与研究成果相比,我们的田野作业明显偏少,直接影响到研究范围的拓展。此外,虽然民俗学产生之初,已经提出比较科学的搜集整理方法,但是,由于搜集者多半是热心民俗的“在野学者”,所以搜集质量大多不尽如人意。譬如说,他们注意的几乎只是文本的自身,而对为什么讲述这个文本,以及语境在文本讲述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几乎没有记录。文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单一的文本记录,直接影响到文本研究的深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民俗的搜集与研究被明显地分为“两张皮”,即:我们的学者所做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书斋式学问,而另一部分热心的民俗搜集家则只热衷于民俗志的搜集,对研究则缺乏起码的关照,从而使研究与搜集之间出现明显的缺环。以五四时期歌谣故事学为例,当时出于研究的需要确有搜集,如顾颉刚为研究孟姜女故事,就曾刊发过征集启事,当时也确实搜集了不少作品,但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别人收集的,研究者本人并没有从事这项基础性工作,因而也就无法利用这些文本故事的其他背景材料,其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追述。此后对《月光光》、《看见她》等作品的研究基本上一直在沿用这个套路。这种缺憾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一批民俗学工作者在祖国大西南通过田野作业,搜集到大量的有关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民俗志方面的资料,他们将这些田野资料与古籍相结合,在取今证古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同时在对神话社会功能的阐释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代表了我国解放前民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的田野作业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特别是由研究者亲自参加的田野作业,对于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它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搜集到更为科学的讲述文本,同时还在于它能够通过研究者的亲自调查,使研究者掌握更多的背景(语境)资料,从而为研究者从事文化功能学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资料基础。

从我国民俗学发展现状看,我国当代民俗学研究仍然存在着搜集与研究相脱节的现象,这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工作中搜集不甚科学,研究不尽深入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因此,加强田野作业乃是中

民俗学在新世纪能否参与世界民俗学对话的惟一切入点。这就要求我们“看重”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民俗调查本身所应有的学术含量,尽可能快地培养出一批“本土”搜集人才,同时强化学者田野作业的力度,使搜集人员学者化、研究人员田野化。

加强田野作业不但能弥补中国民俗学在历史上留下的活态资料不足的缺憾,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需要。如果说考古学的田野作业跟不上,考古对象(如坟墓、宫廷建筑等)尚能得以保存,那么,如果民俗学田野作业跟不上,许多民俗事象就会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快消失而成为千古之谜。中国许多著名的史诗艺人的逝世,已经给中国史诗研究带来不少尴尬,这个教训不能不记取。由于民俗是一种“活态”文化事象,其内涵、功能、性质、意义尽隐含于民众生活之中,要想全面把握民俗运动的一般规律,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重要的途径之一,便是深入田野。在今后的民俗学田野作业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加强多学科关照及多学科协调作战能力。民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学问,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对民俗事象进行综合性研究,以便从总体上把握民俗的演变规律。譬如研究猎俗,你不但要了解其相应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祭祀、禁忌、音乐、舞蹈和其他宗教仪式,同时也要了解狩猎收入在其经济生活中的位置,狩猎的工具、方法、装束等等,这就要求搜集者必须具备民间文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舞蹈艺术、经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成为门门精通的通才,这就要求我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考察,以增强调查结论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第二,调查手段的更新。当代民俗调查与传统民俗调查相比,更强调它的全方位性,只有这样才能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全面的资料,因此照相、录像、录音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成为实录工作的基本手段。另外,对于田野作业成果的保存、整理,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据韩国学者介绍,韩国歌谣搜集后,便以激光唱盘的形式,永久地保存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保存方式层出不穷,随着 VCD、DVD 等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为田野实录的听觉化、视觉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多媒体空间。

第三,加强民俗调查力度。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曾把田野作业调查分为用眼、用耳、用心三个不同层次。用眼就是以—个旅游者的身份去了解当地的民俗,这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它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些诸如民居、祭坛、服饰等表层文化的东

西；用耳则是与当地乡民进行交流，倾听他们的讲述，由此体会他们的文化；用心则是与他们交上朋友，走入土著社会，与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发掘其民俗文化的底蕴与内涵。现在我们所能做到的多半只有前两个层次。近年来我国一些民俗学者确有许多深入民间获取大量田野作业成果的事例，这种持之以恒的田野作业，更容易揭示出一种民俗事项的演变规律。

二、加强跨学科研究，拓展研究领域是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战略

在田野作业中，加强跨学科的观照力度，是为跨学科研究服务的。加强对边缘学科的了解和学习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供人观赏的摆设，它的确确实是现实研究的需要。以研究神话为例，我们知道，许多神话都出自巫师之口，且在宗教仪式上演唱，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宗教学方面的知识。神话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以幻想的方式真实而准确地记录下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与民俗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考古学与文化史方面的知识，以印证神话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并从根本上冰释神话。宋兆麟先生说得好：“民俗学是一门大学问，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许多课题具有边缘性，因而仅仅依靠民俗学研究是不行的”。^[1]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多学几门学问将会使人受益无穷。当然，到底学什么，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需要。纵观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许多优秀成果都是在多学科观照下完成的。

我们强调跨学科研究就是强调问题意识，淡化学科意识。学科意识固然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学科初建、“跑马圈地”时，如果缺少学科意识，学科的建立就无从谈起。但是，学科一旦成立，再强调学科意识，其结果只能是画地为牢，窒息学科的发展。

跨学科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拓展研究领域。从民俗学史的角度看，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是从它的一个分支——民间文学开始的。最初，人们所热衷从事的多半是对故事、歌谣、传说、神话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年中行事、信仰习俗、社会组织等民俗事项也渐渐被纳入民俗学研究范畴，民俗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但总的来说，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始终没有超出狭义的“民”的范畴。其实，所谓“民俗”，不应只理解为“民众习俗”，而应理解为“常民习俗”，这是因为习俗本身不具有阶级性，地主也好，长工也好，尽管生活质量各有差别，但在对民俗的理解与民俗对他们的规范方面，都具有极强的一致性，我们无法设想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一旦当上了皇帝，就会摆脱民俗对他的一切影响。其次，

有些习俗在我们看来似属“官俗”，但实际上根在民间，仍属民俗学研究范畴（如宫中雉戏，宫廷建筑中的风水思想等等），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它们人为地割裂开来。学科范围永远是个历史概念，随着学科发展，学科范围的扩大将是历史必然。

三、加强应用研究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一门学问能否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帮助人们说明了某些问题，解决了某些问题。有了这种功能，学科就会发展，否则只能昙花一现。

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伴随社会需要产生的，19世纪为殖民政策服务的英法德民俗学也好，20世纪初为寻找“农民为什么这么穷”的答案而展开民俗调研，最后使民俗学成为日本“经世济民”之学的日本柳田民俗学也好，莫不如此。我国民俗学运动产生于五四时期，它之所以一开始便成为时代宠儿，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迎合了时代要求，成为整个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此后，1928年的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和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搜集民间文学的群众性运动，都与时代需求息息相关。这就说明，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忘却自己“经世济民”的时代使命。

但必须提及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研究方法的完备，我们似乎渐渐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职责，使研究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兴趣与爱好，使之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宋兆麟先生曾指出，作为一名民俗工作者，他的使命不外乎有两个方面，这便是问俗和用俗。问俗就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什么是民俗，以及各种民俗的来龙去脉；用俗就是发扬良俗，摒弃陋俗。^[2]当然，许多民俗事象是很难用良莠来区分彼此的，它们更多的是无毒的花或是不香的草，需要我们民俗学家去辨析，去利用民俗发展演变的规律来促使某些陋风败俗向良俗的方向转化。现实中，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如将赌博改造成彩票就是很好的证明。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应天时而生的。这里的“天”，就是时代的呼唤。民俗学就是一门在文化重构的呐喊声中诞生的新学。先贤们都清楚民俗学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五四时期、延安时期、解放初期以及拨乱反正之后等各个文化复兴时期中国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之所以能够得以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个学科的生命表现在它的不断探索、不断求新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生长点，这并非附庸风雅、追赶时髦，而是一个成熟学科对社会应尽的

义务。不会转型的学科是没有生命力的学科，它所面临的只有死亡。当然，义务有“隐性”与“显性”之分，至于我们承担哪种义务，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民俗学者，要有自己的使命感，我们不应、也不能愧对我们的时代。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的新的学术生长点。譬如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以及发展民俗旅游等，民俗学便有许多可以介入的领域。作为一名民俗学工作者，他不应该是一名空头理论家，而应该成为焊接连通现在、过去和将来文化发展的桥梁的工程师。他既要让人们清楚自己的文化脉络，也要让人们知道为创造美好的明天应该摒弃什么、传承什么，并为社会变革提出自己的方案。这一点五四时期、延安时期、解放初期我们都做到了，现在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民俗学应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质的学问，也只有这样，民俗学才会受到社会的应有重视。

今天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商品社会。做学问虽然不是做买卖，但“学问”毕竟不是自我欣赏的对象，而是服务于社会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学问也应视为一种商品，制作时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的需要。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科学，国家是最大的买家，这就要求我们民俗学者们时时关注国家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如果你生产的“产品”非国家所需，你被国家忽视，这也是很自然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学者必须加强自己的使命感，使民俗学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当然，学者的使命感与以往的庸俗社会学是两回事。中国学者既不应走回头路，也不应因某些人的误解而就此避而不谈，因为这都有违于学术良心。

当然，基础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尽管这种研究国家不一定马上用得上，但它毕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生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每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不应忽略这种纯学术研究的存在。从另外的一个层面讲，这种纯学术研究如果也被视为商品，它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买家，这便是整个的学术界。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是源头产品，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它的产出，对中华民族整个学术水准的提高，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国家级的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更应大力提倡。

四、加强学风建设是中国民俗学走向壮大的重要保证

加强学风建设，首先要正确对待外国的民俗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积极吸收外国的先进理论和方

法是我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它也将成为未来中国民俗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学问是无止境的，西方民俗学的研究，将永远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目标。但是，正如古人所云的那样，全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在学习他人的学术成果时，也应该有所分析、有所借鉴、有所扬弃。我们应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吸取别国同行优长的同时，回避其不足。举例来说，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所有言论都是正确的，都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譬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神话消失问题，曾经作过这样一个结论，他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因此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样一条经典结论我们讲了不下几十年，但现在想来，不能不说尚有商榷余地。不错，神话确实是生产力尚不发达时代的产物，但这并不等于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会彻底消失。以月亮神话为例，月宫、嫦娥、玉兔、蟾蜍等神话形象，确实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人们尚无法正确认识月球本来面目的远古时代产生的。但人类乘宇宙飞船踏上月球之后，这些神话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事实上，截至目前为止，它仍以各种方式流传于民间，所不同的是，这些神话的功能本身发生了某种变异。所以我以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学习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某些具体结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这样，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理论的学习也应该是这样。

其次，要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近年来，在我们学界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这便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一些学者由于受某种地方利益、民族利益或经济利益的驱动，常常把一些毫不沾边的东西硬说成是本民族或本地区的，而很少考虑到其结论的是否科学。这种狭隘的本位主义作法，不但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为人们认识真理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且，也败坏了我们的学风，使我们的学术殿堂散发出冲天臭气！这是我们每个有良心的学者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需要以一个学者的良知作为前提，我们很难指望一个摆脱不了狭隘的小集团利益的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会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什么出色的贡献。

再次，要强调精品意识，提高科研质量。历史上，我国历代学人都保持有良好的学术传统。上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司马迁，下至当代学术巨子范文澜、陈原、顾颉刚，无一不具严谨的治学风范。但是，随着近年来商品大潮的

冲击, 我们的许多科研成果, 也像掺过了水的牛奶, 变得越来越没了味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 只要字数多, 便是“贡献”大, 至于你是否发现了什么, 似乎并不重要, 这简直是对学术研究的亵渎! 学术价值贵在发现, 贵在创新。我们应发扬前人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下功夫拿出自己的学术精品, 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五、余论

民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科学的研究, 不仅要求我们的搜集工作者学者化, 同时也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者, 走出书斋, 多做些田野作业。这样做不但会使我们的搜集工作更加科学, 同时也会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建立在一个更加牢固、更加科学的资料基础上。在具体研究工作中, 我们应该不断加强队伍的学风建设, 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使民俗学真正成为一门经世济民之学, 同时, 还要不断拓展自

己的研究领域, 加强跨学科研究, 加强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为中国民俗学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宋兆麟. 积极开展民俗文物研究[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8.
[2] 宋兆麟. 民族文物通论[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0.

收稿日期 2002-02-07

[责任编辑 周耀明]

[责任校对 蒋英菊]

[作者简介] 苑利(1958-),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民俗学博士; 顾军(1963-), 女, 北京人, 北京应用文理学院人文系副教授、主任助理。北京, 邮编: 100732。

追念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的《四海为家》出版



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张先生一辈子, 从北京到台湾, 从台湾到美国, 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 往来各地, 沟通有无, 胸襟博大, 最少偏见,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 我们发现, 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 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 “也会说台湾话”, 虽学过日文, 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 自认为是台湾人, 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 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 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 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为了纪念张光直先生, 三联书店最近汇集了与张先生有过密切接触与交往的同行、挚友、学生和亲人撰写的三十余篇文章, 出版了《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一书。正像余英时先生所说: “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全书 25 万字, 定价 23 元。

(山 兰)